

形象学基础

宗坤明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形象学基础

宗坤明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柯尊全

封面设计：宗 垦

责任校对：常再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象学基础/宗坤明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

ISBN 7-01-003250-5

I. 形…

II. 宗…

III. 形象—理论研究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7825号

形象学基础

XINGXIANGXUE JICHU

宗坤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中国煤田地质总局红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年8月第1版 200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1/32 印张：11

字数：266千字 1—5000册

ISBN 7-01-003250-5/B·263

定价：19.60

形象学与人类文明的科学通道

(代序)

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理事长 刘吉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答案很明确：是实践的人！

人民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文明。于是，现实的一切在文明之光的照耀下都作为形象而存在了。历史亦成为形象体系的运作过程。这个过程正是被黑格尔所描述的，也是被恩格斯所高度肯定的——是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内在统一。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有欢歌笑语，也有血雨腥风；有大踏步的前进，也有无可奈何的倒退；有事半功倍的惬意与快乐，也有弄巧成拙的难堪与苦恼……如此，建立一门关于形象的科学，也就是人的自觉所必需的了。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要求，宗坤明同志在《形象学基础》一书中摒弃以“绝对理念”作为这个过程的逻辑起点，而把形象作为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内在统一体来研究，将形象学从众多学科的“屏风”后推到前台来，这对人类文明的建设是很有意义的。

这里，我想就这门学科建设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谈点看法，算是一个老兵对后生的“回眸”，同时也是对历史与现实的一种思考与展望！

第一 关于形象学的历史渊源和时代氛围

仅从字面上看，在人类的认识史上，“形象”这个词由来已久。当然，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其含义是大不一样的。这在本书中也已概要列举。然而，不管这个概念的含义在历史上是多么的混乱，它至少说明了人们对形象的研究早已有之。这些研究的深度当然各有区别，但客观地看，也都构成了形象学的一部分史料。别的不谈，单从中国最古老的典籍《易经》看，其中关于形象的讨论就很充分。这部以“王天下”为旨归的经典性著作，实际上就是以对形象的运演为中轴而展开的。其中虽然有神秘的和不科学的成分，但“象其物宜”的取向是影响深远的。在先哲看来，天地人是一体化的。其变化之道很难窥视，更难用言语表达。于是为了“开物成务”，“故画卦爻”来“参伍其变”，从而引导人们顺其道而行之。这其中到底有多大的科学性且撇开不论，取其实质则不失为人类文明的自觉展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方面的轨迹：一是在天地人一体化的过程中，世界上的一切都不是作为单纯的自然物，而是作为区别于自然物的形象而存在的。“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① 这形象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也就是人们安身立命的依据。二是“以象立教”，“使民宜之”。“《易》者象也”。它

^① 《易·系辞上》

“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因而如果正确地加以运用，就可以“使民不倦”，“神而化之”。而这正是“圣人”“成天下之务”的基本途径。通观这两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古人对形象的研究就是要使人成为自觉的人。这同时也是要把历史改造为文明史。这种动向在历史上是一贯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形象学基础》一书的出版，也就是把这门学科确立起来了；或者说，著者把它从一门“潜科学”变成“显科学”了。当然，这种确立是一种质的飞跃，说是创建也无可厚非。这正好比如说鲍姆嘉滕创建了“美学”；但并不否定美的研究在他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按照宗坤明同志的理解，形象是现实世界的存在方式。它存在于自然、社会 and 精神的总体关系上。这对形象的界定确实是全新的。这种界定是形象学走向科学的第一步。仔细想想，也确实如此。在历史的领域内，一切都处在人和自然的区别与统一中，因而都失去了纯自然的意义。这样的存在用“形象”来指称，是人的实践和认识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告诉我们，形象作为人类文明的伴生物，在人把自己和自然区别开来后就孕生起来了。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形象作为一个历史范畴，虽然是在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被抽象出来的；但它的“根系”是扎得很深的。当然，形象这个概念所蕴含的实际内容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其规定性和力度是大不一样的。这是因为，人类的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要素的发育程度和组合方式必然是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相适应的。我们知道，接近现在形态的人类大约已经存在了二三百万年。人从地平线上站立起来后，起初是在同自然生物的直接交换中来维持生存的。他们经历了漫长的游牧生活才进入相对固定的农耕时代。这期间，人的智力的发展很缓慢，直到六千年前才出现了文字。而文字的发明伴

随着语言使得思想的火苗不断熔合为社会意识的烈焰。这种社会意识和社会实践构成了一种深刻的矛盾内在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中。正是在这种矛盾的作用下，人类伴随着蒸汽机的发明由农业时代进入了工业时代，现在又伴随着信息的资本化向知识经济的时代进军。历史记载，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陆续发明了电话、电影、电视、电脑和半导体、光纤等，使得信息的传输和处理获得了惊人的速度。人们坐在家里，就可以即时看到几万里外发生的事情。这样，事物作为形象而存在的质级便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因为通讯的现代化和世界的整体化，使形象作为信息的载体已大为增值。与此同时，它的视觉冲击力也成了“挡不住的诱惑”。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广告。许多厂商和传播媒体携手大做广告，其实质就是自觉地利用形象的魅力来传达信息、创造财富。而这样做又带动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形象化”。现在，关于“政府形象”、“企业形象”、“窗口形象”、“行业形象”……的问题，常常被提到一种战略的高度来讨论，即是这种形象化的充分体现。概言之，形象的势能在当今这个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爆发；如此便为形象学的确立提供了深厚的现实基础和鲜活的时代契机。这同时也是说，形象学实际上是历史发展到21世纪反映在认识领域内的必然升华。

关于形象的讨论在认识史上是相当可观的，如今又强烈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两个方面在宗坤明的“形象学”中都得到了应有的体现。这也说明了形象学由此而确立起来，其根基是非常坚实的。

第二 关于形象学的科学指向与学科特征

形象既作为现实世界的存在方式，作为在自然、社会和精神

的总体关系中而存在的活性有机体；那么，对形象的研究也就是要揭示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这种揭示和哲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有关学科是一致的。如此，又何须形象学呢？的确，如果形象学没有区别于这些学科的特殊性，那确实是可有可无的。然而，这本书给我们的感觉是耳目一新的。因为，它对历史规律的揭示始终是和形象的创造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说，形象学不但要研究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它还要研究这种规律怎样才能得到最生动和最有效率的体现。这样，形象学就把“可操作性”内在地包含在它的科学机理中。最近《光明日报》刊载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关村与未来首都形象》。文章认为：“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城市的国际化、生态化都将体现高科技发展主流。城市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工业城市’，而是人与自然、经济与文化、物质与精神的融合体。21世纪的首都形象，应定位在全国政治、文化、高科技中心、世界历史名城和国际化大都市上。”不难看出，首都的形象在21世纪应该如何？这就是形象科学所关注的具体问题。诚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既要把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和首都的特殊性结合起来。而这种一般和特殊的统一，在形象学中得到提炼和升华后又成为一般的东西了。形象学也不是要把“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这种规律的具体体现”分开来加以研究，而是要在这两者的综合中寻求和把握其带普遍性的原理，从而指导人们对形象的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形象学也就是一门创造的学问。然而，这里所说的“创造”是发生在历史运动的深层次上的，或者说是整体性的。

从认识史上看，对世界存在方式的研究，在哲学中是一以贯之的。从哲学发展的历程看，人们对世界存在方式的认识，是在“否定之否定”中逐步明确起来的。开始，人们把现实世界看做是自然地生长起来的。人也不例外。他是动物的一支。在这时，

人们力图找到一种最基本的自然物如水、气、火等等来说明世界是如何存在的。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人的实践能力的提高，人们开始认识到人的主体性如何，也影响着人对认识对象的揭示，进而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上述两种倾向便形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最初分野。然而，这种对立必然要走向“中介”。于是近代哲学得出结论：自然、社会和精神处在统一的历史过程中。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事物便失去它作为自然存在的单一性，而成为一种散发着历史气息的形象了。这就是说，形象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地决定的。其研究成果必然要融汇到形象学中。但由形象学的特殊使命所决定，哲学思辨还不足以最大限度地构成形象学的科学张力。它还要和其他多种学科尤其是艺术学交融起来，才能使它的科学使命得到充分的发挥。从现有的研究资料看，很多学科如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文艺学、礼仪学、心理学等等都涉及到形象的问题。不仅如此，在对形象的创造中，自然科学也会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由此而论，形象学就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这种综合的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形象学的理论力度。

在宗坤明的形象学中，这种综合性得到了高度的体现。它没有丝毫的拼凑痕迹，而是作为一种有机的整体出现的。并且，随着整个体系的展开，这种有机性也处在不断的强化之中。体系本身的内在逻辑和这种综合性联系交融在一起，也就使形象学获得了丰盈的血气，令人为之振奋！

第三 关于形象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形象学是研究形象的。从逻辑的角度看，形象当然是形象学的元范畴。研究的结晶也就是对形象这个理性具体的整体把握。

然而，由于形象是在人和自然的区别与统一中而孕生起来的；对形象的整体把握又是为了指导人对形象的创造的。这样，逻辑的起点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规定；而真正的出发点和归宿应该是“现实的人”，或者说是人和形象的现实关系。但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化了。因为人和形象的现实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这种多样性反映在认识领域内，也使人对形象的理解多样化了。从认识史的实际看，人们对形象的界定主要有三种：一是把形象看作人和物的外表；二是把形象看作和人的价值观相联系的知性对象。三是把形象作为历史运动中的活性有机体来看待的。形象的这三种形态实际上是在人与形象的现实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在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和具体形象的关系具有不同的规定性。而形象作为历史运动中的活性有机体，这在上述三种规定性中最具深刻性。它实际上囊括了上两种规定。不消说，在这种意义上确立起来的形象才是形象学的科学对象。但由于上两种规定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在发生作用的；因此也不能抹杀其现实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现实意义又是形象作为活性有机体的具体体现。如交警的警容属于“外表”的范围；但这种外表正是对交警这一形象的历史内涵的表露。如此，从现实出发，对形象的研究既要全面地认识人和形象的多层次联系，又要从中把握主导性的关系。这样，形象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就在革命性的意义上统一起来了。

在宗坤明的《形象学基础》中，有两个概括性很强的概念：一是“形象化”；二是“形象效应”。形象化指形象的发生发展，它展现为一个过程。而形象效应则是指这个过程的一系列环节。由人与形象的现实关系所决定，形象的发生发展实际上是由人在其中起推动作用的；但起推动作用的人又是以形象化的内在机制为依据的。在这种辩证关系中，形象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也就一致起来了。然而这种一致性是通过对立的矛盾关系来展现的。

因此对形象化动力机制的描述也就是要弄清形象化的矛盾结点及其激活方式。由于形象是以三种现实形态与人发生关系的，因而我们既要分析各种形态与人发生关系的特殊性，又要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人们只有把各个层面上的具体规则和总体关系中的一致性结合起来，才能使形象的创造富有成效。这也是形象发生发展的基本走向。由于人在形象化的过程中既是主动的，又是受动的，这种主动和受动的统一也把人改造为形象化过程的实际体现者。在这个过程中，人推动形象的发生发展是通过对社会性的价值尺度的熔炼和完善来实现的。这种价值尺度是全面的，它涵盖着真、善、美的标准。因而当人在形象化的过程中起推动作用时，也意味着这种价值尺度是内在于形象的发生发展之中的。这种价值尺度在形象化过程中的作用，实际上是通过人们调节和改造各种关系来实现的。而对这种关系的调节和改造，又直接与意识的投入相关。形象作为实物形象、意念形象和艺术形象的全部综合，是一个内在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和人们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同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意识的投入亦构成形象化过程的一个方面；但它必须服从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定，才能在形象化的过程中发达起来。这样，历史的趋向性和意识发达的无穷可能性就好比“形象之网”上的经线和纬线，任何形象都是这两条经、纬线的具体结合。质言之，这两方面的交错也就是形象化过程中的矛盾结点。

相对形象化过程而言，对形象效应的分析也就是要从“截面”的角度来把握形象的发生发展。由形象化的矛盾结点所决定，形象效应实际上是现实的人和具体形象在历史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场效应”。这种“场效应”奠立在人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性和深刻性上。人要利用自然，又要在与物质的变换中解放自我。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关系必然要强化起来并决定着人们

改造自然的力度。因而调节和改造社会关系就成为形象效应的本质规定。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任何人都不能为所欲为，但对社会关系的调节和改造又可以使人的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推动形象的发生发展。何以如此，这是由抽象和具体的对立统一所决定的。各种各样的形象作为“形象之网”的一个个“纽结”，必然要体现历史发展的内在趋向；但各种具体的形象对这种趋向的体现又总是各各不同的。这样，在自然、社会 and 精神的总体关系中而存在的形象有两个基本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和物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相互作用，即实践；第二个层次也就是实践和精神的相互作用。这展现为“现实 and 理想”的矛盾。第一个层次是一切形象的基础；第二个层次对具体的形象而言则具有突出的意义。这两个层次在形象中的表现，也就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从而使形象既有普遍的效应性，同时又能给人以独特的享受。和形象的两重矛盾相适应，形象与人发生的“场效应”也就是通过抽象和具体的对立统一来实现的。相应地，形象效应也就是人对抽象和具体这对矛盾关系的自觉运用。

人与形象的现实关系是历史地形成的；而人对这种关系的调节和变革又是人创造历史的基本途径。形象学既要对此种现实关系作出合乎实际的说明；又要说明人在这种现实关系中如何才能有所作为。这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宗坤明的形象学中是衔接得相当好的。他在全面地考察了人与形象的多种关系后确认了形象的科学内涵，继而又区别了形象的总和与具体形象的现实形态，接着从一般的意义上分析了形象化过程和作为其运行环节的形象效应，进而在形象与人的场效应中来把握真、善、美的聚合机制，最后进入艺术领域作总体性的说明。在逻辑地展开的每一步中，又都贯穿着一种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即把它引向历史来“拆解”这种逻辑。因此整部书中跳动着的是—种历史再造的

脉搏。研究人与形象的现实关系和人在这种关系中的作为实际上是形象学的主动脉。这就把科学性和革命性高度地结合起来了。由此可断言，这一学科的兴起将为人们创造一个更加美丽的世界提供一个新的支点。

第四 关于形象学的学术建树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形象学把形象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同时又把这种对象置于自然、社会 and 精神的总体关系中来研究。这就使得形象所包孕的矛盾关系既复杂，又深广。

在认识史上，人们对形象的研究散见于许多学科。反过来说，各有关学科对形象的研究只是从各个特定的角度来观察形象的，研究的也只是形象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环节。无疑，这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形象学的确立准备了条件。在时代的呼唤下，形象学必然要以相对独立的科学形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而宗坤明同志适应历史发展的迫切要求，使形象学卓然而立。仅就此一点，也就值得肯定了。更何况他矢志呕心，十年如一日，是经过充分的思考后而提出来的呢！在《形象学基础》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的许多观点都是很新颖、很深刻的，其论证也是相当严密的。其中，有这样一些基本观点确实不凡：

一是客观层次论。客观世界的各种事物都是存在于不同层次上的。不同的层次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赖、相互过渡。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然而，运用这个原理来观察世界和分析问题，却有高下之分。因为从不同的角度看，可以把客观世界划分为不同系列的层次。如从进化的角度看，可以把客观世界划分为无机界、有机界和人类社会；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看，可以把世界

区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从技术形态的角度看，又可以把世界划分为狩猎时代、农耕和手工业时代、机械作业时代、电气化时代、自动化时代和信息时代……。这些划分都是有根据的，也能独到地说明世界。但在形象学的视野里，宗坤明同志用哲学的目光把世界的客观性分作自然、存在和规律三个层次，这既是高度的抽象，同时又很有现实意义。“自然”主要是对历史的源头而言的，这也可以说是人类生存的基地；“存在”主要是对现实而言的，这也可以说是最广袤的包容，其中充满了各种随机性，同时也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了各种可能并积聚着能量；“规律”或曰趋向性主要是对历史的进步而言的，这也可以说是人类的使命和归宿。这三个层次不是相互分立的，而是在同一个过程中相机并举的。但三者又不是在同等的意义上发挥作用的。形象效应首先是由客观性不同层次的相互过渡而引起的。人与形象的场效应也就是要把不同层次的真实性“稀释”开来，并从中“提取”历史的必然性。而作为现实的人要赋予形象效应以积极的意义，还要把“提取”出来的真“反射”到形象中，从而使形象成为“最高真实”的体现，这同时也使人的能动性在“真”的形象里得到积极的肯定。

在宗坤明的《形象学基础》中，关于真的层次界定及其过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存在于这三个层次上。但由于层次间的相互联系，各个层次上的存在又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既要看到它在所属层次上的规定性；又要看到它在层次间相互联系中的可变性。以此我们也可以对人的形象做出恰当的评价。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在客观性的不同层次上生存的。因而，各个层次上的人群和其素质的比重如何，往往决定着一个时代的风貌是处于上升阶段，还是处于混乱

或倒退的状态。对于同一个人而言，他也可能在真实性的不同层次上不断改变自己的形象。在正常情况下，个体人都是从真实性的低层次向高层次迈进的。孔子所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但由于高层次的客观性和低层次的客观性是相通的，因而个体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其生存质量由高层次倒退到低层次也是常有的事。比如一些人顺应历史的发展，为了革命的事业而出生入死，但当革命事业受到挫折时，往往心灰意冷，随波逐流，这就从“规律”的层次倒退到“存在”的层次了。这种人如果再堕落为行尸走肉，或为了肉体的享受而残害同类，那就从“存在”的层次下降到“自然”的层次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确立形象学的目的就是要使客观性的不同层次作正向的过渡，从而把更多的人带到光辉的彼岸；这同时也是人为了赢得更高的生存价值而走向永恒的必由之路。

二是实践机制论。和上述客观性的层次观相联系，宗坤明同志提出了历史本体和实践机制的概念。在哲学史上，关于“真”的问题总是和“本体”相联系的。这个本体在逻辑的诠释中总具有先在性、绝对性、无限性和永恒性。这样的本体也就是康德所说的“物自体”，或者说是自在本体。其实，在宗坤明看来，在历史的运动中，本体既是作为世界变化的原因，又是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依据而存在的。这样的本体是人们通过本体论创造出来用以开发自身和约束自己的，是自我创造与自我约束的统一。因而，本体在形象的总和中也就是作为人类生存的参照系而存在的。它的作用体现在以其内在矛盾的解决对于发挥人的能动性所展示的意义。不消说，这样的本体是和现象共生的，是对现象的吐与纳，是属人的、历史的本体。这种本体既秉承自在本体的客观规定，同时又是对自在本体的积极扬弃，因而是不断的，是

处在建设之中的。它是在人对自然的开发和对自身开发的综合统一，是在具体、多元和不可逆过程中所形成的内在建设性。而对这种建设性的把握，就必然要深入到实践的矛盾机制中。要理解实践的矛盾机制，这首先要分析实践和意识的相互作用。在通常情况下，意识总被看做是主观的东西；而在实践的过程中，意识也有其客观的一面。列宁说：“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很重要的。”^①这里所说的“转化”就是意识客观性的体现。在宗坤明看来，意识的客观性是由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的客体化而一同展现出来的。意识通过对实践的参与构成新的现实性时，也就使意识赋予相应的客观性了。实践和意识都经由过程的客观性而展现出一体化的趋向。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实践分作感性化的具体实践和过程化的实践。感性化的具体实践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直接体现。这主要是从发生学的意义而言的。过程化的实践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相互作用的综合表现。它所依据的是最高层次上的客观性，亦即规律性。相应地，人们对这种规律性如何认识、如何驾驭、如何利用，也就是实践的主要问题。这样，便出现了实践的规律性和人的能动性的矛盾关系。现实地看，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既不是完全按照本能行动的，也不是完全按照规律性的要求行动的；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这就是说，从发生学意义上的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关系过渡到规律性与能动性的矛盾关系，这期间还有个中介环节在起作用。宗坤明把这个环节定义为实践的凝聚力和耗散性的矛盾关系。这三重矛盾关系的交错也就是实践的内在机制。这三重矛盾关系都在抽象中发展着自身的内容；同时又在“共振”中展现出它们的统一性。人们对这种统一性的自觉把握

① 列宁：《哲学笔记》第117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与运用，就会使形象的创造获得旺盛的活力。不难看出，宗坤明对历史本体与实践机制的发现和阐述，是极富生命力的。他把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一致性”进一步具体化、深刻化了。

三是利益通配论。人的生存离不开衣、食、住、行，因而利益问题在人的实际生活中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宗坤明深知利益问题在形象的发生发展中是举足轻重的，因而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形象学把形象的总和看作人们的生态背景，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形象与人处在一种功利性的价值关系中，因而在形象效应中必然贯穿着利益的骚动。这种利益的骚动即体现为善与恶的对立。但由客观的层次性所决定，形象的总和与现实的人所构成的利益关系也具有层次性，因而善的功利性原则在形象效应中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以财富的形式满足人的生存的需要；二是以其所体现的利益关系满足人的发展的需要。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又对前者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两个方面的统一使形象与人的利益关系愈来愈复杂。在这种关系中，善的实质体现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善的功利性原则在形象效应中即被改造为个人和社会以利益为纽带的相互促进。相应地，善的规定性也就是在社会关系的变革中而趋于完善的。因而在具体的利益关系中衡量形象的善与不善，一是要看这个形象对人是否有利，亦即有无使用价值；二是看这个形象所体现的利益关系与整个的社会关系是否协调；三是要把它放在过程中看是否和历史发展的方向相一致。把上述三个方面统一起来，即要在全面的联系中来确立善的规定性。在这种善的规定下，人对利益的享受应当体现为他在增大社会利益时的一种匹配。而放在整个过程中看，这种利益的获得应当是伴随着社会进步的一种通配。也只有这种通配的利益才是最善和最实在的。基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致性，它一方